

刘卫东 著

被“家”叙述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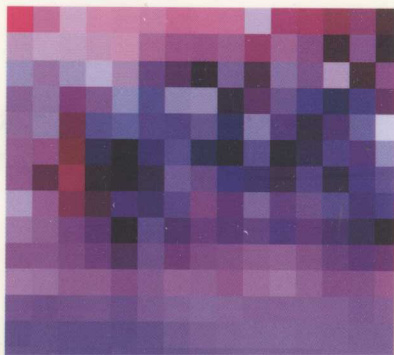
20世纪 中国家族小说研究

欲休还说的“中国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小说

家族叙事中的“创世纪”

宏大叙事：家族小说大厦中的“构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被“家”叙述的“国”

20世纪
中国家族小说研究

刘卫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家”叙述的“国”——20 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研究/刘卫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04-8597-1

I. ①被… II. ①刘…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3414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作为类型小说之一，同时也包藏了“现代中国”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进程的“家族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绵延不绝，但是由于内涵界定较为“困难”等问题，长时期未得到重视，直到 21 世纪前后，这个课题才因为对“百年中国”的回眸而渐次升温。近年来做“家族小说”课题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是愈来愈多了，就文本分析而言，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但就家族小说背后的意义诠释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因为诸多学者对问题把握的宏阔视野的欠缺，所以对家族小说延宕波及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内涵发掘不力。

刘卫东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一——“中国现代性”——来俯察从近代以来的种种家族小说写作的内在机理。以“现代性”为平台的学术研究是近年来人文科学的重要路向，也提供了不少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把舶来的西方“现代性”理论没有消化就生搬硬套的现象也很突出。卫东的著作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证了“中国现代性”这一存在不少争议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了 20 世纪的中国家族小说，在多方面具有学术价值和探索意义。

“中国现代性”的理论争论，从 1840 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

能的事情，然而，家族小说却又恰恰绕不开这个话题，经过作者对中外诸多理论的爬梳，又经过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基本框定了一条清晰的理路。论著在面对这样宏观的问题的时候，“小心求证”，并未因为尚无定论就信马由缰，而是步步深入，逐步将问题引向自己试图讨论的领域，并给与了具有一定深度的阐释。我以为，书中所强调的“文化现代性对个人的诉求”应该是本书的核心价值，虽然有悖论的意味，然而却概括出了“中国现代性”的缺失。对于具体论述中的一些看法，虽然我不能完全赞同，但是，由此而延展开来的“被压抑”问题的探讨却是击中了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现代性”命门的问题。因此，把近代以来的诸多家族小说文本放在这样一个论述框架中来检视，它们就具有了鲜活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刘卫东关注的问题焦点在于“不是家族小说叙述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被叙述。”这样，使卫东的研究没有掉进概念的泥淖，而是通过具体的文本阐释丰富了“中国现代性”这一概念，并以此将研究引向更为深入的领域。一些“经典”家族小说在中国现代性的视野中，获得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看法，如巴金向“日常伦理”的回归、《红旗谱》中冯贵堂角色的“矛盾”等。就著作来看，卫东并没有拉开架势来夸夸其谈大做文章，在整个结构上也没有使用恢弘的理论篇章结撰整饬，而是抓住一些细节的关键进行鞭辟入里的论证，使得许多问题就变成了可证的“真问题”，而非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饶舌的“伪命题”。

为了寻求家族小说的流变“模式”，论著使用了叙事学的方法，在家族小说研究中，也是较为有新意的尝试。用叙述学的方法来分析和概括家族小说应该是有章可循的，借鉴这种方法从形式美学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解决不少难以归纳概括的问题。论

著对叙述学，尤其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普研究民间故事的方法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一些研究进行了借鉴，也针对家族小说的特殊性进行了“改造”，使该方法变得简洁实用，但是可能也隐藏了不少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不过，我以为只要不是生搬硬套，能够从此视角得到对家族小说的新的认识，也未尝不是一条可以接受的分析路径。

家族小说的“发生”的原因探究，也就是从“原型”意义上来厘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成为这部著作哲学命题寻觅的出发点，就此而言，这本论著就多少具有了作者人格化的追求。其实，卫东的这个课题是其博士论文的选题，距今已近十年，当年，他的这一选题做的人还很少，困扰他的问题是切入点和价值理念的确定，当然，还有家族小说的理论界定与文本遴选的历史上下限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艰难的问题，选择本身就是需要勇气的，显然，这一选题的难度一直延续困扰了他有十年之久，做课题是艰难的，而思考问题则是更艰难的。从论著看，与卫东当年答辩时候的毕业论文，有了很大改动和发展，这说明他对此问题仍在不断思考。

我同意“家族小说可以被视为中国在 20 世纪命运的寓言”的结论，由此来透视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云谲波诡的动荡的 20 世纪已经谢幕了，但是留给“现代中国”的问题还远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清理，而这个工作，恐怕是从从事当代文学、文化的研究者所不能绕开的，也是需要责无旁贷去担当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家族小说”是卫东学术的发端，而 20 世纪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性”诸问题是他的方向，此路绵绵无绝期。

卫东是一个相貌忠厚沉稳的学者，做事很有分寸感。但是，一旦有了想法，他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有了这样的品格，

不愁他做不出学问来，而时间才是检验学术的最好试金石。我相信卫东会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不就是一个时间等待的事情嘛。

丁 帆

2010 年 1 月 9 日

目 录

序言	(1)
引论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小说	(13)
第一节 欲休还说的“中国现代性”	(13)
第二节 作为民族国家文学“风向标”的 20 世纪 家族小说	(45)
第二章 宏大叙事:家族小说大厦中的“构件”	(88)
第一节 叙事程序	(88)
第二节 角色	(132)
第三节 叙事模式	(171)
第三章 小叙事:家族小说抽样分析	(188)
第一节 《狂人日记》:与写作“初衷”的一次 错位	(188)
第二节 《家》:从“出走”到“回归”	(204)
第三节 《红旗谱》:革命大旗下的家族幽灵	(224)

第四节	《白鹿原》:谁在白鹿原能过好日子?	(240)
第五节	《丰乳肥臀》:传奇的土壤,家族的花	(261)
第六节	《笨花》:地方志与女性“现代性体验”	(280)
结语		(295)
参考文献		(300)

引 论

任何一个课题的确定，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拖着一条隐秘的历史之尾。对本书而言，更是这样。文学、家、20 世纪中国与衍生出来的叙事、历史、父亲、逆子、革命、民间等概念共同编织了一幅“现代中国”图景，它们错综、扭结的联系让人感觉如同面对无法解开的麻团，既头痛又无法回避。

一 在历史深处失踪的“出走者”

新中国历史上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注定要面临更多的困惑，因为，与其他年代出生的人相比，他们成长的背景更为模棱两可、暧昧不明。他们初高中阶段接受的是“共和国传统”教育，80 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上了大学，又开始经历商业文化的侵蚀，头脑中固有的与新来的东西杂糅在一起——接受、分辨、批判，好像各样的水果被沙拉酱拌在一起，味道很奇怪。于是，他们失去了味觉。众所公认，认识自我是生命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对 70 年代的人来说，这个工作更为迫切。“我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他们进入了成熟的年龄，却仍然懵懵懂懂，没有哪一代人比这一代人更想弄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行动。他们仰望蓝天，渴望飞翔，却可悲地像个虫豸一样匍匐在地上，不知什么时候能长出翅膀。一位出生在 70 年代的作者在一篇对 70 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研究文章中，使用了《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这个题目，他在考察了 70 年代出生的几位作家之后，认为“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验’，可能仅仅局限在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最终还是会带来更多、更大的困惑。我想比较值得去做的，是应该确认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底在怎样制约着我们的生存体验，以及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们对于现实和自我的想象。”^① 我以为，他说出了 70 年代人的共同渴望，但是，我不同意把它作为一个方向，更赞成将其视为一个过程——虽然这一代人已经处在不大不小的年纪。当他们开始睁开自己的眼睛的时候，渐渐发现，“自我”和“外部”都是牢笼，他们是无援的囚徒。

在阅读过程中，那些叛逆的青年的命运往往能够吸引住我，他们仿佛是蛰伏在心中的另一个我。对现状的极端憎恨、打破秩序的勇气和为理想牺牲的渴望，使我暗自心仪。现代人其实一直想找到一个让他愿意为之付出时间精力甚至牺牲生命的东西，虽然在后现代语境里，这样说有反讽的意味。按照马克思·舍勒的说法，牺牲是人的一种本性和冲动：“生命的牺牲无疑是有的，甚至还是更高价值意识上，寓于更高价值之中的生命形式；但并不因此意味着每一种牺牲都是一种促进生命的行动。肯定有一种自由奉献生命之财富，生命力之美好的自

^① 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 70 年代出生作家的笔记》，《上海文学》1999 年第 9 期。收入陈思和、杨扬编：《九十年代思想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8 页。

然充溢的牺牲。……这种牺牲渴望原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并先于一切特殊‘目标’和‘目的’，就是说，计算、知性、考虑随之把这种‘渴望’纳入‘目标’和‘目的’。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为何故、为何事、为何人，但我们心中渴望牺牲！”^①这一段表述令人震惊。把牺牲这么一个理性的事件解读为灵魂的自然品性，大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虽然不能证明这个理论，但是结合自己的体验，笔者以为舍勒说出了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牺牲不讲条件，我觉得并不确切。生命固然有“牺牲”的“冲动”，但是必须要找一个交代给自己的原因。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牺牲的渴望，但是许多人的牺牲并没有价值。这时，又有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毫不犹豫为理想牺牲生命的多是青年？青年更喜欢牺牲吗？有一种观点认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次以‘民族’、‘民主’为价值指向的文化、政治、社会运动中，青年们都是以扮演‘启蒙者’、‘拯救者’这一类角色的行动来展开其反抗的。热血沸腾地扮演‘青年’角色的年轻人们，虽然常常遇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压制乃至弹压，但他们多不怀疑自己代表着民族/国家的利益，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他们也确信民众对他们抱有期待，迟早会有掌声响起。而年轻人自身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权利诉求、不满以及改变自身社会状况和地位的群体愿望等等，通常被裹挟在他们的角色行动中。由于缺少将自己独立的愿望和欢乐从‘青年’角色中剥离开来、加以正当化的能力和条件，中国的年轻人在被神圣化、模式化的同时，也遭遇了被扭曲、被异化的尴尬。”^②将青年们的行为放

① [德] 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2—63页。

②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在政治行动的线索中考察，尤其是放在历史“传统”中考察，的确可以看到青年在社会政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但是，为什么担当这个任务是青年？而不是中年或老年（他们的人生经验应该更丰富）？这是青年成长过程中生理冲动决定的还是历史机遇的选择？我想更多地知道一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是时代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是时代的问题，他们是怎样面对的？这样面对是正确的吗？如果是人的问题，人应该怎样超越？

如此惊心动魄的问题，得到了众多敏锐而又有才华的作家的关注，突出地反映在 20 世纪文学中。巴金的《家》中有一个觉慧，是个“时代青年”（也就是现在的“愤青”），对于同龄（他似乎永远 18 岁）的青年来说，他的狂热非常迷人，他的叛逆让人激动。18 岁出门远行，是每个人精神成长史中注定会碰到的一块暗礁，如果不是小心绕过，就必将与之撞出耀眼的火光，改变青春期的走向。觉慧在 30 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暗礁”，鼓励了很多青年离开家庭，奔向“革命”。“革命”又是什么呢？为什么“闹革命”就要离开家庭呢？二者是对立的吗？正如巴金后来坦诚承认的，他对此也一无所知。当然，作家们并不是思想导师，不负责提供答案。觉慧的命运在《家》里没有说，在续集《春》、《秋》中，仍然没有交代，似乎失踪于历史深处。他的命运成为一次戛然中断的旅行，这很让关心他的人惦记。但是，觉慧没有淡出历史，他的背影出现在其他作品中，类似的人物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还有不少：《财主底儿女们》中的纯祖，《四世同堂》中的瑞丰，《红旗谱》中的朱老忠、运涛（红色经典中的情况更特殊），《白鹿原》中的兆鹏、兆海、白灵、黑娃，《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女儿们……虽然在细节上不同的地方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离

家寻找“出路”的叛逆者，是一个人物系列。而浏览西方文学史，却能发现西方作家并不这样处理人物和家庭的关系，也几乎不写这样的人物。^① 换句话说，这个“人物系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土特产”。

二 中国现代^②史上的那场噩梦

关注有关“出走者”人物系列小说的时候，可以发现它们都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重量级的作品——多部作品被称为“史诗”，也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成就。这些作品以宏阔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反映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至少，作家有这样的愿望和野心。笔者更感到有兴趣的是，同样的一段历史，在《红旗谱》和《白鹿原》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讲法？历史与历史的讲法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不同的讲法的背后，又有什么更值得注意的内容？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名言），当代史又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悠久古老，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断代角度看，每一个“时段”都是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应该承认，有的环节是相对重要的，不仅承上启下，而且是关键的转折点。对中国来说，刚刚过去的 20 世

① 家庭成员“出去”、“回来”从来就没有成为西方文学作品的母题。参见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在中国学界，将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称为“现代”，将 1840 年到 1919 年之间称为“近代”，本节为了讨论的方便，与西方的“古代、现代”对应，将中国所谓的“近代”也纳入“现代”。

纪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的意义将会越来越显得重要，而20世纪带给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也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张汝伦在谈到自己从西方哲学向中国现代思想史转向的时候说：“中国现代思想史之所以吸引我，使我不惜‘僭越’去研究，实在是因为它并不是过去或完成了的东西，而是构成我们今天思想的基本条件。身为中国人，总要关心中国的问题，关心中国问题，必然要关心中国的思想。虽然历史并非是由思想创造的，但也确如伯林所说的，包含在历史的运动和冲突中的观念和人生态度，使这些运动成为人类的历史，而不是自然事件。观念并不创造历史，但却塑造历史，就像它不创造生命，却给予生命意义一样。要了解现代中国，要了解中国的问题，要了解中国的走向，就要了解中国的思想。它是这个民族内在生命的脉动。”^①人总是或多或少有些私心，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与张汝伦一样，也是源于它跟我们自身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民族内在的“脉动”也是一个复杂错综的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张汝伦从西哲转向中国现代思想史，也不算十分“僭越”，这不过是一个学科内的学术背景的转换。而由家族小说的演变，对照现代思想史的变迁，不妨也可自称为一次“僭越”。在笔者看来，20世纪的家族小说，正是从“小说中国”的角度，记录了现代中国的每一条年轮。

从对20世纪中国的叙述中，不难看到一条或隐或显的线索：沉沦与复兴。20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段历史上最惨痛的噩梦。一般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

^①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国这个老大帝国就不断遭受外国的蹂躏。^① 从此时起，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问题的发生，都是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最让人难堪的是，清军北洋舰队在 1894 年甲午海战败给日本，长期被中国人瞧不起的东邻小国也从中国割走土地，获得赔款。对此，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谩侮侵削，若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② 康有为的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是当时朝野的一致想法：堂堂的天朝大国怎么啦？根据近代史学者的研究，甲午中日战争并非完全是军事实力的对比，而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③ 不管怎么说，战败的现实直接引发了呼唤“维新”的风潮。不但光绪皇帝，就连西太后也感到了改革的必要。在西太后看来，中国需要改革和吸收外来的东西，但是要有一定的原则，“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④ 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没有理由反对中国走向富强的主张。康有为和支持他的光绪帝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在 103 天的时间里，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

① 发生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常常被叙述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黄仁宇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病根早已经种下：“万历十五年公元为 1587 年，去鸦片战争尚有 253 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为标准，则前后相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70 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0 页。

③ 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④ 费行简：《慈禧传言录》，见《戊戌变法》第 1 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464 页。

教育、军事国防等方面的上谕。某种程度上说，这相当于把中国旧制度全部颠覆，重新来过。20 世纪末，关于戊戌变法是是非功过的争论很激烈。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和保守》中认为，戊戌变法过于激进，不能保留传统中比较好的东西，并且形成了一个激进主义传统，贻害不浅。一时间，激进和保守之争成为一个热点。^① 这里重新叙述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在当时的情形下，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应该怎样改，改成什么样子的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回头看 20 世纪中国风云，这个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将上述问题归纳为一个概念：“中国问题”。^②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贴切，也很重要的概念，但是也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深处，确实存在着一个情结，就是如何能够富强起来，重新回到核心的地位。这种文化心理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很少有如此迷恋自己的文明，以天下老大自居的。古代印度和近代英国也很强大，但都没有出现类似思想，而中国这个老大梦在后来又一破再破，对民族文化心理影响甚大。刘小枫从现代性的角度，认为“中国问题”就是中国如何纳入“现代”的问题，指出了 20 世纪中国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内容。其实，“中国问题”一直存在，不过，只有到了 20 世纪末，才被更清醒地意识到而已。

① 余英时的文章及回应和争鸣见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本文第一章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讨论。